



抗战时期大后方 社会变迁研究 (下)

尚季芳 党庆兰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北抗战大后方文献资料整理研究”
(项目编号: 16AZD037) 资助出版

抗战时期大后方 社会变迁研究 (下)

尚季芳 党庆兰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变迁研究：全2册 / 尚季芳，
党庆兰主编. —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9.1
ISBN 978-7-311-05513-4

I. ①抗… II. ①尚… ②党… III. ①社会变迁—中
国—近代—文集 IV. ①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302589号

策划编辑 梁建萍
责任编辑 马继萌
封面设计 郇海

书 名 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变迁研究(下)
作 者 尚季芳 党庆兰 主编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press.lzu.edu.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甘肃春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482千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5513-4
定 价 98.00元(上、下)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目 录

(下)

社会建设

- 333 抗战视域中“田园城市”理论传播与贵阳市政建设 敖以深
- 342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消防设施综述 胡 懿
- 348 抗战时期重庆城市街道卫生整治 黄 河
- 366 筚路蓝缕之功
——高显鉴乡建运动研究 罗 玲
- 377 抗战时期重庆职业指导所述论 谢长法 陈 磊

社会问题

- 389 论陪都时期重庆城市近代化中的企民矛盾
——以北碚富源电力公司为例 杜俊华
- 399 积极的慈善救助
——抗战时期甘肃的工合运动 谢 羽

思想观念

- 411 桂柳会战期间广西民众的抗战意识与社会动员 陈静怡
- 423 论冯友兰的抗战建国思想
——国际秩序、总体战与道德 汪 力

- 438 毛泽东与《再论持久战》 谢从高
 447 延安文人婚恋和创作心态探究
 ——大文学视野下的萧军日记考察 张武军 杜蕊蕊

文化团体

- 463 景物、符号与国家:民国时期的左公柳书写与保护 储竞争
 472 明耻教战
 ——抗战时期翦伯赞先生的明史研究 何 刚
 484 抗战大后方的文化
 ——雷石榆在西南地区抗战文学创作活动及评介 何 辉
 497 烽火薪传: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播迁及保存 侯培和
 515 浅析抗战时期促进浙江大学内迁遵义湄潭的动因 胡友平
 523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报刊的抗日舆论宣传
 ——以《申报》为例 梁 云
 528 黎东方与大后方通俗讲史的兴起 吕 昕
 536 论蒋介石抗战新闻思想 施 欣

民族和边疆

- 565 抗战视阈下的新疆汉族商帮 贾秀慧
 574 抗战大后方民族上层支援抗战研究
 ——以西康省为例 周正龙

国际外交

- 591 救存、援助与获取:战时中美图书资料交流研究(1940—1945) 艾智科
 600 战时国民党人对韩国独立运动的观察
 ——以日记为中心 冯国林
 619 略论抗战时期中外科技交流及其对重庆的影响 胡 攀
 627 蒋介石与旧金山会议中共代表问题决策 贾钦涵
 002

- 637 抗战大后方的中苏文化交流
——以《中苏文化》杂志为例 蒋 娜
- 645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与军事工作指导评析 王明前
- 653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修建各国驻渝使馆馆屋概论 姚 旭
- 663 美国主流社会眼中的中国大后方抗战电影纪录片《苦干》
——尝试从影像史学视角的考察 周 勇 刘婧雨

历史地位

- 679 西安抗战遗址的保护与利用 路中康 陶 亮 刘燕花 龚 琦
- 687 美国驻华领事馆文献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刍议
——以前期抗战为中心 李 玉

社会建设

抗战视域中“田园城市”理论传播 与贵阳市政建设

敖以深

(贵州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3)

摘要: 抗战时期是贵阳市政建设加速发展时期。“田园城市”理论的传入为贵阳城市规划提供了借鉴, 贵阳市政的创建以及市政体制的早期现代化、《贵阳市政》的创办和市民对贵阳市政的参与、城市地域的拓展与贵阳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等, 标志着贵阳城市从传统封闭开始向现代开放的城市转型演变。分析贵阳市政的早期现代化, 有利于深化对抗战特殊背景下贵阳城市现代化转型的发展轨迹和特殊规律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 抗日战争; 贵阳市政; 城市现代化

关于现代化的定义, 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 是一个全方位、多层面变革的历史进程。国内史学界为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般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现代化称为早期现代化(20世纪80年代的论著多用“近代化”术语)。城市的现代化既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市政的早期现代化是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包括市政理念、市政体制、市政管理和市政建设等诸多内容。抗日战争时期是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 包括贵阳市政在内的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地域空间结构和城市功能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早期现代化因素在贵阳城市得到了加速发展。关于抗战时期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近代化)的研究, 个别学者已经有所涉及, 有的成果将贵阳城市近代化作为整体进行了探讨^①, 有的成果对贵阳市政的个别领域进行了研究^②, 但从

*作者简介: 敖以深, 男, 贵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①关于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的整体性研究, 主要成果有徐扬的《论辛亥革命后的贵阳城市近代化》(《贵阳金筑大学学报》, 2004年第4期)、张玉龙的《抗日战争与贵阳城市近代化》(《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9年第1期)、吴光俊和欧阳思良的《抗战时期的贵阳城市近代化》(《贵州文史丛刊》, 2007年第4期)等。

②关于贵阳市政的研究, 主要成果有吴光俊的《抗战时期的贵阳市政建设》(《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年第5期)、黄沛骊的《1941—1945年贵阳城市管理体制述评》(《贵州社会科学》, 2009年第1期)等, 内容涉及抗战时期的贵阳市政建设、城市管理体制等。

城市早期现代化的视角对贵阳市政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目前仍然十分薄弱。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抗战时期贵阳市政的早期现代化问题进行分析，并进而关怀到抗战时期类似贵阳这样的西南大后方的传统省会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加速迈进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轨迹及其规律性认识。

一、“田园城市”理论的引介和贵阳城市规划的借鉴

1898年10月，英国学者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出版了《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著作，1902年发行第二版，书名改为《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这一版的书名和正文一直被以后各版沿用至今。针对当时西方高速城市化背景下在大城市中出现的系列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霍华德在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田园城市”理论，其核心是关于城市建设和社会改革的理论，他以“城市——乡村磁铁”理论为基础，把社会发展的一定目标视为城市规划的依据，主张将城市和乡村的各自特点吸取过来，取长补短，加以融合，形成一种具有新的特点的生活方式，从而避免各自的缺点，建立新的兼备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霍华德建设“田园城市”，其意图在于“提高所有各阶层忠实劳动者的健康和舒适水平”，实现这些意图的手段，就是“把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健康、自然、经济因素组合在一起，并在这个市的土地上体现出来”。^①他的“田园城市”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把城市规划作为推进社会变革的一种手段，把社区内经济活动的组织、社会生活的安排、物质环境的布置以及付诸实施的经济保证等统统纳入城市规划的内容”^②，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理想城市的一种思考，对当时和后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通过中国市政学者的积极引介而传入中国后，对民国时期市政学者的市政理念和城市体制、城市管理、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具体就贵阳城市而言，虽然还没有挖掘出足够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来说明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传播到贵州大地的详细情况，但从该理论于民国时期在中国的影响以及贵阳在市政规划、市政管理和城市建设中的系列举措可以看出，“田园城市”理论对抗战时期贵阳市政的影响是存在的。例如，王克章在《从战时三年建设计划说到贵阳市政建设》一文中提出，贵阳城市建设，应“向着清洁、整齐、朴实、安详四个基本原则，建设出一个风景优美、清整雅洁、田园化乡村化而又富于道德化现代化的贵州典型式的新都市”。^③此外，省政府主席吴鼎

① [英] 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著：《明日的田园城市》，金经元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页。

② 金经元：《霍华德的理论及其贡献》，载《国外城市规划》1990年第1期，第40页。

③ 王克章：《从战时三年建设计划说到贵阳市政建设》，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第3期，第5页。

昌、贵阳市长何辑五、贵州省建设厅厅长叶纪元等在其提出的贵阳市城市规划设想中，主张在远离市中心区划分住宅、文化、工业区建卫星城的设想，以及市政建设须田园化、乡村化的理念和建筑设备合乎防空条件的要求，与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十分吻合。1941年9月，贵阳市结合国民政府颁布的《都市计划法》相关规定和贵阳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制作出台了贵阳市城市规划，形成了以城市区为中心，按工业、商业、政治、文化和住宅区等明显功能区域渐次向外放射，将郊区平旷之地建设成为卫星城体系的规划思路。该城市规划的颁布，对于抗战时期贵阳城市的市政管理和市政建设发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如果上述官员和学者的城市规划设想不足以说明贵阳市政理念对霍华德理论的借鉴情况的话，那么再看刘可宗的《论市区规划与自然发展》一文中，他在对霍华德理论进行介绍的基础上，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赞赏态度。文章指出，1898年，霍华德在其所著 *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 一书里，理想到都市可以建造在乡村中，都市的设计要使工厂、住宅、广场等都能安排得便利而适当，认为这种人为的都市，不要使它过于庞大，等到都市发展到相当庞大过了某种限度时，就要在别的地方另建一座。但市与市之间，要留有充足的余地，使得每一个都市的周围，都有着空旷的乡村。读了霍华德的言论，“更足以见都市设计的重要性和伟大性”。^①除刘可宗外，我们再次分析同时期其他人物的有关城市市政的主张，其与“田园城市”理论的吻合或大致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说明抗战时期贵阳市政对沿海城市市政经验的吸取，以及贵阳市政对包括“田园城市”理论在内的西方城市理论的借鉴。例如，钟耀天在《贵阳市政建设之途径》中提出贵阳市政建设的注意事项：一是市政建设计划化。认为贵阳市政工作，应参照《都市计划法》，拟订好市政计划，该计划是“根据贵阳市一切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经济的情况而制定的一种建设方针”，其最大的作用是“使贵阳市得到最完美的发展，同时在施行的过程中避免无谓的浪费”。^②二是市政建设国防化。针对都市人口稠密不可避免现象，主张市政中“安全设施最为重要”^③，并发动市民安全运动。三是市政建设农村化。提出要注意“使城市与农村打成一片，使四周的小村镇犹如环绕贵阳的卫星，要繁荣贵阳，必须同时建设四郊”。^④四是市政建设社会化。认为贵阳市政建设的理想和方针，在消极方面，“要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免蹈其覆辙（城市社会问题）”，在积极方面，“要谋市政建设社会化，借以实现民生主义”。^⑤此外，同时期的其他一批市政学者、政府官员，也针对贵阳市政的某些事项，提出了相关的见解。尽管他们的见解在某些问题上有所不同，但就总体而言，大都主张克服西方国家和我国沿海城市发展的弊病，主张结合贵阳城市实际，借鉴西方国家和我国沿海

①刘可宗：《论市区规划与自然发展》，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第3期，第1页。

②钟耀天：《贵阳市政建设之途径》，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第7期，第1页。

③钟耀天：《贵阳市政建设之途径》，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第7期，第2页。

④钟耀天：《贵阳市政建设之途径》，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第7期，第3页。

⑤钟耀天：《贵阳市政建设之途径》，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第7期，第4页。

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避免大城市发展带来的诸多城市社会问题，建设田园化的美丽新都市，力求使城市和乡村得到协调发展。

抗战时期贵阳市政在一定程度上引介并借鉴了包括“田园城市”理论在内的西方城市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相关理论，这既促进了贵阳市政的早期现代化，同时也是贵阳市政向城市早期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体现。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田园城市”理论在贵阳的实践情况并非如最初愿望，但诸如重视城市规划的理念、城市地域空间的拓展、城市住宅小区的建设、创办《贵阳市政》“宣达市政政令”并“征集市民对于市政的批评和建议”等举措的实施，无疑对贵阳市政的早期现代化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贵阳市制的创建以及市政体制的早期现代化

市制的创建是城市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举措。在20世纪20、30年代，市政改革的呼声在全国各地迅速高涨，创建市制、成立城市政府成为市政改革的首要目标。贵阳市制的创建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民国初年，在全国大多数省会城市相继实行市制的情况下，贵阳也开始了设市的艰难诉求。1921年春，根据贵州省议会决议，设立自治筹办处，筹办全省地方自治，其程序为先办贵阳市自治，以作为全省之模范，然后渐渐推广到各县，以至于乡镇，普及全省。1923年，贵州省政府改组，自治筹办处因之取消，特设市政公所，其职责“与筹办处原拟之计划，大不相同，而贵阳之设市，不能不谓胚胎于此”。^①至1926年，周西成主政贵州省府时，将市政公所改为路政局，从事公路建筑，“方在襁褓中之贵阳市，乃从此根本夭折”。1930年8月，贵阳的士绅们再次积极奔走，呼吁贵阳设市，但因种种原因，贵阳改行市制的诉求落空。1936年，贵阳再次提出了实行市制的诉求，然因条件不备特别是财力不足而予搁浅。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贵州的战略地位空前提高，不仅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还被国民政府纳入了“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的国防中心区体系，以及“中央模范省”建设的国防计划，这使贵阳城市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本身也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加速了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的转型步伐。随着贵阳城市战略地位的极大提升、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文化教育的空前繁荣和城市人口的迅速膨胀，贵阳市制的创建再次提上了日程。吴鼎昌主政贵州以后，根据省会城市贵阳的发展变化情况，加紧了贵阳设市的系列申报准备，经过多方努力，贵阳设市的诉求最终获得了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批准。1941年7月1日，贵阳市政府正式成立，任命贵州省政府委员何辑五兼任贵阳市首任市长。

贵阳市制的创建，极大地推进了贵阳市政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根据《贵阳市政府组织规则》规定，贵阳市政府在政权组织上实行市长独任制，设市长1人，对内管理市政，指挥监督所属机构及职员，对外代表城市政府，发布市令。贵阳市政府作为城市最高行政机关，其下设参事、秘书室、警察局、工务局、卫生局、第一

^① 窦觉箬：《建设新贵阳市刍议》，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第6期，第3页。

科、第二科、第三科、第四科、第五科、第六科、征收处、协济处、水道工程处、会计室、合作室、游民习艺所、妇女习艺所、土地测量队、土地登记处、市立民教馆等部门。各局、科、室职掌也有明确的规定，例如，警察局掌警政；工务局掌贵阳市政工程建设；卫生局掌医疗卫生、环境卫生；第一科掌民政自治及农工商业之管理指导；第二科掌财政；第三科掌教育；第四科掌地政；第五科掌役政。^①此外，贵阳市政府还设立市政会议和贵阳市设计委员会。市政会议通过行政协议制度，商讨市政重大决策。市设计委员会“聘请士绅及专家组织”，“借收集思广益之效”。^②鉴于贵阳设市前税收混乱及战时驻境、过境等非地方机构增多的情况，“按照事实需要，又呈准核定增设征收处及协济处”。^③1942年7月，增设了第六科，将原第一科负责的社会管理职能移交该科专管，故也称其为社会科。1942年9月，根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组织法成立统计室，依据统计法令办理各种统计。

在参事、秘书室、警察局、工务局、卫生局、第一科、第二科、第三科、第四科、第五科、第六科、征收处、协济处、水道工程处、会计室等部门之下还设有许多股室，例如，在参事之下设有统计室，在警察、工务、卫生三局之下设课，并于秘书室内设有视察、第一股、第二股、第三股、第四股、第五股、第六股等，在第一科内设合作室，第三科内设督学，第四科内设技士，同时并设估计专员1人，办理全市土地估价事宜。经过多次机构变动，贵阳市政府建构了市政府一局、科、室一课、股的三级市政分层管理体制，各层职掌有明确分工，“举凡保甲、财政、教育、土地、兵役、治安、建设、卫生、社会、水利、救济、合作、精政诸要端，靡不循名敷实，各有专司，同时导章成立”。^④由此可见，在贵阳市政府成立后，贵阳市政体制日益走向组织化、法制化、专业化道路，所有这些，正是贵阳城市迈向早期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三、《贵阳市政》的创办和市民对于市政的参与

《贵阳市政》是抗日战争时期贵阳市政府贵阳市政编辑室印行的一份半月刊，由贵阳市政府发行，总售处由贵阳市中华南路的文化服务社负责，代售处为全国各大书局，贵州印刷所承担印刷业务，依法呈请内政部查记（贵州省图书杂志审查处杂字〇六八号）。期刊最初定价为每本四角（后来有所增加），邮费另定。^⑤1941年7月1日贵阳市政府成立后，为“协助市政之发展”“宣达市政政令”“征集市民对于市政的批评和建议”，不久便成立了贵阳市政编辑室，专职《贵阳市政》的编辑印行。根据《贵阳市政府出版〈贵阳市政〉办法》规定，贵阳市政府出版《贵阳市政》的目的：（1）阐述国父遗教总裁言论；（2）倡道市政建设；（3）披布市府施政

①贵阳市政府：《贵阳市政府组织规则》，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创刊号，第24页。

②何辑五：《贵阳市政府成立纪事》，载《贵阳市政》1942年第2卷第10、11期合刊，第1页。

③何辑五：《出席全省“县政会议”报告词》，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第4期，第16页。

④何辑五：《贵阳市政府成立纪事》，载《贵阳市政》1942年第2卷第10、11期合刊，第1页。

⑤贵阳市政编辑部：《本刊定价》，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第2期。

情形；(4) 宣达政令；(5) 训练市民；(6) 研究抗建之理论与实际问题等。^①该刊由贵阳市政府参事室办理，设总编辑1人，编辑若干人，其人选由市长派员兼任之，刊物的出版、经理、推广事宜，由市长指定人员分别照办。为充实内容撰编专门文稿及解答读者各项特殊问题起见，得延聘特约撰述若干人。

剖析《贵阳市政》办刊宗旨、主要栏目、投稿规程等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期刊在“协助市政之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贵阳市政》的办刊宗旨包括四个方面内容：甲、发扬本府政纲及实施状况，使市民明了真相，以协助市政之发展；乙、灌输市民应具的知识，引起对于市政研究兴趣；丙、征集市民对于市政的批评和建议；丁、研究本市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部门之建设问题。^②为服务于其办刊宗旨，《贵阳市政》对期刊主要栏目进行了明确规定，其内容除文告、规程、报告、纪事外，其他关于市政之专著、论述、建议、时论、特载及各省市政调查，无不收罗采录，以供研究。为此，期刊出台了《贵阳市政府〈贵阳市政〉投稿规程》，对市民投稿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明确规定：甲、市民对于市政有所建议或规划有所投稿者，均所欢迎，唯以关于市政为主体，不涉他项问题。乙、投稿字数，每篇最好由两千到四千字左右，特约稿不在此限。丙、各种文字以通俗为主，文言白话均可，但需缮写清楚，一律加标点符号，如系论述，并请附寄原文，或祥示原文名称，稿末注明地址，以便通讯，至稿揭载时署名与否听投稿者自定。丁、来稿一经登载，酌致薄酬。戊、投寄之稿，无论揭载与否，概不检还，稿件内容，本刊有增删之权，但投稿人不愿增删者，可于投稿时预先声明。己、投稿者请寄贵阳市政府贵阳市政编辑室。^③通观《贵阳市政》各期所载内容，都能够严格按照以上要求认真执行。事实上，这一期刊的创办及其围绕以上要求的正常运行，本身就是贵阳市政向城市早期现代化迈出的重要步伐。

《贵阳市政》期刊的创办，为贵阳市政府宣达政令和广大市民参与市政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平台。期刊从创建、印行到管理，从文章内容的选用、编辑到登载，都与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密切相关。正如余华沐在《新贵阳》一文中所指出的：“创刊《贵阳市政》这定期刊物，使市民认识新贵阳建设之重要，而予以协助推行，则官民之间打成一片，那伟大的建设力量，将使市政当局所拟具的预定计划，能一一完满的实行。”^④期刊所开设的专载、论著、市政会议、法规辑要、半月评论、调查报告、市政动态、领导讲话、市民建议等内容，范围广泛，视野开阔，涉及抗日战争时期贵阳城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等领域，同时，期刊还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材料以及时人对于市政的认识和研究成果，其中绝大部分是贵阳市政的相关内容，部分内容为外地市政的经验介绍。通过对《贵阳市政》及

^①贵阳市政府：《贵阳市政府出版〈贵阳市政〉办法》，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第6期，第18页。

^②贵阳市政编辑部：《本刊的宗旨》，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第2期。

^③贵阳市政编辑部：《贵阳市政府〈贵阳市政〉投稿规程》，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第2期。

^④余华沐：《新贵阳》，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第2期，第10页。

其所登载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部分还原当时贵阳市民参与市政的概况。

“宣达市政政令”是《贵阳市政》的办刊宗旨之一。市政府通过一定的方式，适时向市民公布市政信息，既可以让广大市民及时了解政府的相关工作，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争取更多市民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是向市民进行市政知识教育的有效途径，可以让市民接受更多的关于市政方面的知识，提高市民的修养和素质。《贵阳市政》登载的大量法规、市政会议记录和领导讲话等，是贵阳市政府“宣达市政政令”的具体举措。例如，程式的《新都市与新市政》，分析了一般都市与市政的缺点，将其归纳为八种：①都市的死亡率高于乡间；②都市人民体格衰弱；③都市人民精神颓败患精神病的很多；④都市的道德不良；⑤都市自杀率比乡间高；⑥都市的犯罪多于乡间；⑦都市的贫穷多于乡间；⑧都市的性道德比乡间更坏。^①如果进一步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与归纳，“不外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够“轻此重彼，或是彼先此后”，而是要“同时并进，同时解决”。因此，建立新都市新市政的对象是“废除以前都市的缺憾”，一个新都市的设施，“应该筹及它的永久性固定性”，并且要“顾到一个都市当前的一切传统习惯、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经济情况”。^②程式关于一般都市与市政缺点的归纳至今虽然已经有了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但是，他的相关内容介绍，在当时为广大市民认识新都市、建设新都市提供了帮助，增进了市民对都市和市政的认识和了解。

“征集市民对于市政的批评和建议”是《贵阳市政》的又一办刊宗旨。《贵阳市政》为广大市民参与市政交流、表达市政诉求、发表市政建议或批评等提供了机会，登载了大量与贵阳市政有关的论著、建议、特载等，为“协助市政之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为广泛征集市民对市政建设的意见，《贵阳市政》在期刊内，“特专开‘市民信箱’，以为市民发挥意见的园地”。这一措施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参与，“先后接到很多有关市政改革的可贵意见，足供本市政规划的参考”。^③针对市民提出的各类批评和建议，特别是“昧于当前的事实，奢望过殷者”，市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这些意见，“设使不加解答在市民心理上蔓延，就会流为昧于事实的恶意攻击，与歪曲批评，牵制今后市政的发展，在负市政设计责任的人有这些观念，为害更烈，充其极，足使整个的城市规划，犯好高骛远、全盘落空的毛病”。^④因此，政府组织相关人员综合各种意见进行解答，例如，郑一平在《有关贵阳市政规划的几个问题》中就对市民提出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意见、市政规划，“恒以‘物质美观’为唯一目的”的意见以及一些不实事求是的意见进行了解答，并就拓展贵阳城市地域问题提出了个人分析意见，与其他人的不同观点和建议进行了对话。在《贵阳市政》登载的文章中，类似这样的由市政府组织人员与市民进行市政对话和交流并解答各种建议意见的事例屡见不鲜。

①程式：《新都市与新市政》，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第7期，第5页。

②程式：《新都市与新市政》，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第7期，第6页。

③郑一平：《有关贵阳市政规划的几个问题》，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第7期，第8页。

④郑一平：《有关贵阳市政规划的几个问题》，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第7期，第8页。

四、贵阳城市地域的拓展与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

贵阳城市拓展地域和改变空间结构的相关问题，在贵阳市政府成立之初就引起了关注，“一时主张拓展市区的意见，甚嚣尘上”。^①为统一思想，省政府主席吴鼎昌提出了拓展市区的原则：“循乎自然之演进，以应自然之需要”，拓展市区的条件：“划归市辖之每一地区，亦与其条件大体适合，最要点为人口与财力，一合条件，随时可以划入，方符于自然之演进需要。”^②根据吴鼎昌提出的原则和条件，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地域不断地拓展，一是重新勘测贵阳市区范围。1941年7月5日，新成立的贵阳市政府会同贵筑县政府进行实地土地勘测，贵阳市区范围为“东至打渔寨，南至龙家寨，西至马王庙，北至六冲关”，贵阳市区面积进一步拓展。二是进行市地整理。贵阳市界勘定后，根据中央地政法规，参酌各省市地政实施经验，贵阳市开展了土地整理工作，其范围：“宅地约八千市亩，水旱农田园圃连同山林杂地河流道路约共九万六千余市亩，环城公路内，以人口稠密，地价高昂，土地分割细碎，环城公路外，梯田坡土又多丘坎零星，共约十数万丘。”^③通过土地整理，促进了土地的利用。三是拆除原有城墙，扩建新城。贵阳南边的城垣为旧城亦称老城，官署、银行、邮局、电局以及比较繁荣的地方多集中于此。北边的城垣为新城，地处老城北门外，多为会馆、庙宇。两城面积南北长七八里，东西宽三四里，其中大南门、次南门、北门等比较繁荣。通过系列措施，分期拆除城垣，使贵阳市区面积不断拓展，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贵阳城市地域面积较战前明显扩大。随着市区面积的不断拓展和城市规划的付诸实施，贵阳城市空间也在不断地进行重新建构。

为进一步了解关于贵阳城市地域拓展和城市空间演变的状况，我们再次分析了抗战初期贵州省建设厅所拟的贵阳市道路系统计划。根据该计划及后来不断修改的情况，贵阳城市主要划分为内城和外城两大区域，其中，内城以旧城为中心，就原道路基础上进行改道，外城为旧城的延伸，主要位于旧城的北部区域，并向周边延伸。根据相关设计，由南明河以东至老东门止，规划为工业区。由老东门起，延长至新东门，经红边门，北绕六广门，西迄大西门，定位为住宅区，其中，由城北红边路之西，北城河之东，沿环城路旁，约占地四百（原文模糊）方丈计划开辟为平民住宅区，预定全区住两百户，每户约占两方丈，每内分两间，先筹主半数后，其余陆续兴建之所需要经费由省禁烟行政经费结存项下拨付。^④由大南门外浮玉桥对岸的张华制革厂之南起，沿南明河东岸河套而南，约占地二百九十六市亩，计划定

①郑一平：《有关贵阳市政规划的几个问题》，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第7期，第9页。

②吴鼎昌：《勘市政工作》，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创刊号。

③张维光：《贵阳市地整理问题》，载《贵阳市政》1941年第1卷第7期，第12页。

④周如瑾：《贵州省土地整理之计划及其办理经过》，载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第33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印行，1977年影印本，第16489页。

位南明区住宅区，预定共编宅地一百八十号，分为甲乙两种，面积以平方市丈计，别为大中小三种等，大者约一百方，中者约八十方，小者约六十方，住宅区土地征收之经费，由放领地价和公共建筑费之收入项下抵补。^①城西的讲武堂、省立高级中学及省立师范学校所占之区域定位文化区，并由次南门外蝉宫桥起，经省立师范和大夏大学接城西环城公路开筑文化区公路，名为文化路。城南的观风台，城东的东山和仙人洞，城北的黔灵山，城西南的观音洞等处均开辟为风景区，并修筑公路以便市民游玩。城南的图云关外地方，确定为贵阳市第一公墓区，城北的六冲关（鹿冲关）附件地方，确定为贵阳市第二公墓区。

贵阳城市面积的拓展和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不仅体现为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且在城市内部布局上也有充分体现。贵阳内城的地域布局，可用经线和纬线进行概括叙述，经线是以中央的干线最重要，此线北端从六广门外洗爵塘的环城公路为起点，南端至箭道街的环城公路为止，相当于将环城公路椭圆形的内城对剖开，此线定为一等线，宽四丈四尺。在市道竣工地段，各商店房屋则须一律改建西式骑楼路。与中央经线平行的有第二第三第四的经线三条，第二和第三经线定在中央干线的右侧靠东的一面，第四经线定在左侧靠西的一面，各线的北端各接环城公路，南端总集于大南门口，为二等线，路面宽三丈六尺。至于城内纬线，也是分为四条，第一和第三两条因有同等重要性均定为一等路，第二和第四两条则定为二等路，路面的宽度一如经线之规定。各纬线之两端都是和城外的环城公路衔接，至其所经的地点规定：第一纬线，由威清门外环城公路起，经威西路，出新东门，再接环城公路；第二纬线，以原界于新老城之间的旧城基辟筹；第三纬线，由大西门直达老东门；第四纬线，在老城之间次南门起，西至与环城路相接。至于外城的空间布局和路线，最基础的干线，就是将全城围绕一周的环城马路，其余就有至附廓住宅区、商业区、风景区等的马路，比方由次南门外南明河的石方起，至大南门太平路止定为商业区，其外以西来的向南直走的环城公路为市道之枢，内则以沿城垣东流的南明河为内范之界，并依新都市的市路计划，特设等和一等市道各一，二等纵线三，三等横线五。^②经线和纬线道路的纵横交错，使城市空间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

①周如瑾：《贵州省土地整理之计划及其办理经过》，载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大陆土地问题资料》（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第33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印行，1977年影印本，第16490页。

②周如瑾：《贵州省土地整理之计划及其办理经过》，载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大陆土地问题资料》（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第33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印行，1977年影印本，第16488页。